

中美战略经济对话与中美关系*

潘 锐

摘 要 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机制是中美建交以来规格最高的经贸交流机制,同时也是唯一一个被美国冠以“战略”两字的中美之间的双边对话。本文试图探讨中美战略经济对话的动因和缘起,回顾以往所进行的两次战略经济对话,对中美战略经济对话进行定位,并分析中美战略经济对话的未来发展。

关键词 中美战略经济对话 中美经贸关系 中美关系

中图分类号: D8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4812 (2007) 05-0001-07

2006年9月20日,国务院副总理吴仪和美国总统特别代表、财政部长保尔森在会谈后共同宣布,根据胡锦涛主席和布什总统达成的共识,正式启动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机制(Strategic Economic Dialogue,简称SED),旨在解决双边经济关系中需要长期关注的问题。SED对话一年两次,轮流在两国首都举行。一个月前,布什总统在8月21日和胡锦涛主席的通话中提出了建立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机制这一建议。^[1]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机制由此应运而生,它是中美建交以来规格最高的经贸交流机制,同时也是唯一一个被美国冠以“战略”两字的中美之间的双边对话。这表明,中美两国在经济领域的互动业已具备全球性和战略性的影响力,双边对话的意义已经上升到了战略层面。

胡锦涛指出,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既加深了相互了解,也为双方的合作提供了新的契机,不仅有利于继续推进中美经贸合作,而且对地区和世界经济的稳定发展也将产生积极影响。胡锦涛希望双方充分利用好这一新的工作平台,认真总结经验,加强沟通协调,努力使这一机制越办越好,为全面推进中美建设性合作关系作出更大贡献。^[2]本文试图探讨中美战略经济对话的动因和缘起,回顾以往所进行的两次战略经济对话,分析中美战略经济对话对中美关系的影响,并就相关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

—

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是在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中美经济关系日益密切的情况下,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最大的发达国家在经济领域的战略性对话。其动因在于:

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是中美两国经贸关系迅速发展、相互依赖日益加深的产物。1972年美国尼克松对中国的历史性访问结束了中美两国长达23年之久的对峙,这不仅对两国政治关系、亚太与整个世界格局产生了重大影响,亦为双边经贸往来打开了通道。1972年中美双边贸易额极低,仅为1288万美元,1979年也只达到24.5亿美元。1979年中美正式建交后,两国签署了双边贸易协定,1980年起两国又相互提供贸易最惠国待遇,从而为双边贸易发展提供了现实的基础。根据中国海关统计,自1979年至1989年的10年间,中国自美国进口和对美出口的年度增长率分别为15%和22%,这一增长率既大大超过了世界贸易的年均增长率,

* 本文为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美国国际经济政策研究项目成果。

亦远远超出中国外贸的年增长率。20世纪90年代以来,双边贸易额继续保持持续增长势头。1997年中美贸易额为489.9亿美元,2000年增至744.7亿美元,2002年增至971.8亿美元,2006年更是高达2626.8亿美元。美国1979年即为中国的第3大贸易伙伴,1996年则跃升至第2位。中国1980年是美国的第24位贸易伙伴,1996年起跃升至第4位。目前,中美两国已互为对方的第二大贸易伙伴国。据中方统计,从1979年两国建立外交关系开始到2006年,双边贸易额增加了106倍,相当于每年增长18.9%。美方的统计显示,双边贸易额增加了144倍,相当于每年增长20.2%。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2006年发布的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全面评估对华贸易关系的报告中,列举了美国从对华贸易关系中的受益之处:廉价中国商品促进了美国无通货膨胀的经济增长;中国是美国增长最快的主要出口市场,2001年以来,美国对华出口增长5倍于对世界其他地区出口的增长,2004年、2005年美国对华出口增长率分别高达22%、20%。^[3]正是因为存在坚实的基础,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才有了可能。

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是美国对华政策调整的结果,是布什政府在经济领域对华新策略的体现。布什政府2001年上台以后,认为克林顿政府将中国视作“战略伙伴”的做法既过于理想化,也不符合现实,“战略伙伴”只能适用于日本和欧洲那样的盟国,中国绝对不是美国的“战略伙伴”。当时的布什政府国家安全事务顾问赖斯便表示,中国是一个有着尚未解决的重大利益的大国,在台湾等一系列问题上,中国不是一个维持现状的国家,而是要改变现状。因此,中国不是美国的“战略伙伴”。^[4]布什政府用“战略竞争者”取代了“战略伙伴”。之后,随着“9.11”事件的发生与国际局势的变迁,中美关系中合作的基调成为主流,“战略竞争者”不再出现在双边交流的词汇中。尽管如此,布什政府仍然认为中美关系对美国不具有战略意义,并刻意避免在双边关系中使用“战略”一词,中美副外长级的对话被美方称作高层对话而非战略对话即为明证。布什总统本人在形容中美关系时,亦仅用“复杂性”来表示。2005年佐立克副国务卿提出了“利益相关者”概念,这一源自经济领域的概念表明,在中国崛起过程中,美国希望既享受中国发展的益处,又能引导中国未来发展的方向。“利益相关者”既是对中国发展的一种承认,也是对中国提出的要求。财政部长保尔森作为知华人士比佐立克更进一步,强调从长远的战略角度来处理中美关系,强调中美两国对世界经济繁荣的共同责任,强调中国的稳定和繁荣对于美国具有巨大的利害关系。保尔森称赞中国已是“全球经济领导者”,并说希望看到中国成功。因为领导者是要分担责任的,美国想要的是中国主动承担责任。保尔森说服布什总统,把两国经济关系上升到战略高度,开始了中美战略经济对话,这是中美之间众多高层对话中第一个被明确冠以“战略”之名的。这一举措表明,布什政府在经济领域实施了对华新策略,这是中美在政治和安全领域因分歧无法结盟后,两国在经济上相互依存的体现,也是美国在经济领域提升双边交往层次的体现。

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是为解决中美经济所面临的问题而设立的一种对话机制。近年来,双方经贸往来在原有基础上又有新的提升,贸易额不断攀高,相互依赖度持续加深,中美经贸关系进入了一个持续发展的新阶段。随着经济全球化和中国经济成长、开放度的不断提高,中美两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最大的发达国家的经济关系日趋密切,双方经贸合作优势互补,互利共赢,发展迅速,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也成为亚太地区和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促进因素。然而,中美经贸交往在给双方带来利益的同时也会出现一些分歧和摩擦,这就需要建立一个新的讨论平台,去面对现实,着眼长远,坚持从战略高度和全球角度看待和处理两国关系,有效解决经贸合作中出现的问题,防止误解和对抗,避免将经贸问题政治化,以推动中美经贸关系稳定健康发展。而且,中美双方都非常清楚,如

果中美经贸关系因某种原因遭受重大挫折，对两国经济都会有极大的负面影响。

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是美国对中国经济实力增长以及中国在世界经济格局中扮演重要角色的认可。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公布的数据，2005年，中国的GDP超过了2.2万亿美元，跃居世界第4位，占世界的份额由2001年的4.2%提高到2005年的5.0%。主要农产品中，谷物、肉类、棉花、花生、油菜籽、茶叶、水果等产品产量已位居世界第1位。主要工业产品中，钢、煤、水泥、化肥、棉布、糖产量居第1位，发电量居第2位。2005年进出口贸易总额达到了14,221亿美元，占世界总贸易量的6.5%，位居世界第3。这些数据表明，中国经济实力近20年来不断增长，已经成为一个在世界经济中举足轻重的发展中国家。而且，21世纪初最突出、最明显的经济现象是中美经济主导了整个世界经济的发展：中美两大经济体在过去5年内创造了全球GDP $\frac{2}{3}$ 的增长。这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国外报纸声称，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机制有可能在未来取代八国集团（G8）在世界经济中的影响。

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机制将聚焦双方长期发展共同关心的问题，并为双边关系更好发展奠定基础。最重要的是，两国的高层领导人将拥有定期交流的机会，可以私下交流彼此最大的需求。美国财政部长保尔森认为，这个机制的启动不仅向美中两国，而且也向全世界各国传递了一个重要信息，即美中正在为建立一个互利的关系而努力，这个关系包括减少经济风险和减少政治和安全的风险。吴仪表示，这个对话机制将对全球经济发展和全球稳定安全产生积极的影响。^[5]显然，中美战略经济对话虽然是双边对话，但其影响却远远超越了双边范畴；中美战略经济对话虽然是经济领域的对话，但其影响亦远远超越了经济领域。

二

2006年12月14-15日，首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为期一天半的此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由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的特别代表、国务院副总理吴仪与美国总统布什的特别代表、财政部长保尔森共同主持。首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围绕“中国的发展道路和中国经济发展战略”主题，就城乡均衡发展、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增长、促进贸易和投资、能源、环境和可持续发展等5个专题、11个分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中国和美国在首次战略经济对话中不仅讨论了宏观经济问题，还在证券、金融、能源、航空等领域达成了一系列实质性协定：中美双方同意在中国设立纽约证券交易所和纳斯达克代表处；美国支持中国加入泛美开发银行；双方缔结了促进美国对华出口的融资便利协定；中国将加入“未来发电计划”政府指导委员会；中美同意于2007年1月重新启动双边航空服务谈判。中美还同意利用现有机制，增加更有效且环境可持续性更强的能源利用、促进个人旅游和商务活动、发展援助和多边开发银行贷款等方面的双边合作。保尔森表示，在对话过程中，美方从中方的介绍中学习到了很多东西，增加了对中国各方面的情况和政策的了解。

2007年5月22-23日，中美第二次战略经济对话在华盛顿举行。对于此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中美双方均表现出了高度重视。5月9日，胡锦涛主席和布什总统通了电话，就如何推进中美战略经济对话进程，保持中美经贸关系的活力，推进中美建设性合作关系不断向前发展交换了意见。美国财长保尔森为了准备此次对话，取消了赴德国参加八国集团财长会议的行程。这固然是一种重视的表现，但同时也可视为对中方的一种压力。美国行政部门试图通过此次对话取得具体的成果，缓解来自国会的压力，避免中美之间的经贸摩擦升级。

就美方来看，来自美国国会的压力压缩了保尔森的回旋空间。民主党控制下的美国国会，有将中国经贸议题引入政治领域的趋势，美国国会也正在酝酿诸多涉华经贸问题议案，涉及

中美贸易不平衡、中国操纵人民币汇率、知识产权保护、中国开放国内市场、中国履行 WTO 承诺等等问题。而且，美国财政部每半年要向国会提交一份有关哪些国家操纵汇率的报告，而此次会谈恰好在这份报告提交之前，这也被认为是一个可以对中国施压的手段。事实上，受压之下的保尔森希望第二次战略经济对话能够取得一些具体进展，美方在会谈之前就已经放出风声，希望在国会眼皮底下进行的这次对话，能够不同于以交换意见为主的第一次北京对话而有所斩获。保尔森在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明确表示，“我希望看到具体的成果，以此作为我们正在朝正确方向前进的路标。”^[6]

中方则采取了务实的策略，商务部副部长马秀红率领的中国贸易投资合作促进团在美国 24 个州的 25 个城市开展了一系列贸易、投资促进活动，并陆续签署了 138 个贸易或投资协议，总金额高达 326 亿美元。此外，5 月 18 日，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公告，宣布自 2007 年 5 月 21 日起，将银行间即期外汇市场人民币兑美元交易价浮动幅度由千分之三扩大至千分之五，从而向美方表明，中方在坚持“主动性、可控性和渐进性”三原则的基础上，正以负责任的态度和做法推进人民币汇率改革。

这次战略经济对话是去年首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的延续，参与对话的官员人数众多，双方共有 33 位部长参加对话，其中中方就有 15 位正部长、10 位副部长，这样阵营庞大的政府代表团在中美两国历史上都是空前的。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在会议开幕式上致辞。对话期间，双方就服务业、投资、透明度与高技术贸易、能源与环境、经济平衡增长、创新等议题进行了坦诚交流和深入探讨。吴仪还带领部分中方代表与美国国会议员进行了四次交流和沟通。

通过讨论，双方取得了一系列有利于增强和深化双边经济关系的具体成果：在金融服务业领域，中国将逐步扩大符合条件的合资证券公司的业务范围，把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的投资总额度提高至 300 亿美元（原为 100 亿美元）；允许外资法人银行发行人民币银行卡。美方确认中资银行在美开设分行的任何申请都将根据国民待遇原则进行审批；并承诺与中国开展金融监管人员的交流。中国和美国进出口银行签署了多个合作协议。在非金融服务业和贸易领域，双方同意扩大现有双边民用航空运输协定范围，大量增加两国间每年航班班次，在 2011 年全面开放货运航权，在 2010 年开始谈判客运全面开放的协定和 timetable。在经济平衡增长领域，美方将向中方提供发展金融市场和农村金融方面的技术援助。两国同意就劳动力市场政策进行人员交流和信息共享。在创新领域，中美双方海关签署了《关于加强知识产权执法合作的备忘录》。根据备忘录的规定，中美两国海关将在人员往来、执法实践技术和执法经验交流、执法数据交流和案件信息通报等方面进一步加强合作。

三

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是一个过程，战略对话不应该成为追求急功近利结果的工具，因此，中美战略经济对话的着眼点主要在于未来。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根据购买力平价测算的全球 GDP 中，2004 年美国的份额是 20.9%，中国为 13.2%；到了 2006 年，美国的份额降至 19.7%，中国则升至 15.1%。短短的 2 年内，中美差距就缩小了 3.1 个百分点。虽然按照购买力平价折算的 GDP 不是现实的国力，但是它反映了未来的发展实力。在美国和国际社会眼中，中国具有极大的发展潜力。因此，要从中美长期战略合作的高度来认识中美经贸关系。双方应从维护两国国家利益的高度来加强两国间的经贸合作，避免各种形式的贸易保护主义，妥善解决经贸合作中的各种问题，为推动中美建设性合作关系不断向前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是在尝试构建一个框架，着眼于中美两国长期经贸关系的框架。中美经贸关系业已发展了数十年，双边共同利益日益深化，但就未来而言，需要有更进一步的共同利益框架。所以，中美双方不仅应该在传统经贸领域，而且应该在非传统经贸领域加强合作，寻找更多的共同利益，这样，双边经贸关系发展就具有了持久的推动力。如同安全领域区分为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两个部分一样，经贸领域同样也有传统和非传统领域之分。传统经贸领域指的是商品贸易、市场准入、服务业以及知识产权保护等等，而非传统经贸领域则涉及经济增长模式，投资、储蓄与社会保险，教育，劳动力问题，环境保护，医疗保健等等，其范围更为广泛，合作空间更为巨大。而且，在非传统经贸领域的合作之加强，或许可以有助于双方在传统经贸领域减少摩擦，降低猜疑。

中美战略经济对话致力于建立和强化战略互信，没有互信，中美之间就没有未来。信任在任何关系中都是至关重要的。在经济全球化的当今世界，经贸关系在任何双边关系中都占据着极其重要的地位，中美关系也不例外。加强有关经贸问题的战略磋商，不仅有利于解决经贸方面的摩擦，也有利于建立和强化战略互信，从而为中美关系的稳定发展奠定一个坚实的基础。但是，两国政治文化方面的根本不同却继续制造着误解和不信任。例如，当中国官员向布什政府保证，贸易摩擦将会以合作方式加以解决，这意味着一种承诺。但华盛顿的情形就不是如此了。当共和党控制国会时，布什在阻止反华的保护主义立法方面就已经遭遇了很多困难。目前两院的多数席位都被民主党占据，问题就变得更加难以控制了。^[7] 如何建立中美互信是两国之间面临的重大挑战。

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是一个协商的平台。中美经济之间有太多问题需要这样一个平台来协调，需要这样一个平台让双方决策者当面听取对方的想法和意见，避免错误判断，避免意见分歧发展成为冲突。解决贸易争端的最有效的途径是谈判，而最糟糕的办法就是惩罚性行动。协商并不是只有一方提出要求而另一方无条件照单全收。美国对中国可以提出各种各样的要求，中国同样可以对美国有很多要求。目前，美国和中国已经有至少9个双边或多边委员会、对话机制、合作机制以及论坛等，这些机制都是为了解决中美关系中各个方面所面临的问题，但发挥的作用十分有限。^[8] 因此，如何区分中美战略经济对话与中美商贸联委会等不同机制，使中美战略经济对话真正成为两国经济领域的战略对话，尚有待努力。

中美战略经济对话还负有探索未来国际经济秩序的重任。作为世界上的两大经济体，中美两国需要积极应对目前世界经济失衡的局面，直至重建新的国际经济秩序。在美国国内，目前有多种有关未来国际经济秩序的观点。一种观点要求建立新的布雷顿森林体系，还有一种观点认为需要一个新的类似1985年的广场协议。这些观点与其说是解决问题的方案，不如说是显示国际经济秩序需要重建的迹象。新国际经济秩序没有中国的参与是不完整的，就美国方面而言，新的世界经济秩序亦需将中国融合进来。中国融入的新的国际经济秩序应当是一个自由和开放的市场经济。中美两国都有责任为此而努力，因为这是两国经济健康发展都需要的一种公共物品。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所要追求的就是在公共物品层次上取得共识，而这样的共识是解决具体问题的前提。

中美战略经济对话面临着新的挑战。在中美战略经济对话进行了两轮之后，美国国会方面对对话的不满已表露无遗。在不少美国议员看来，美国要求人民币升值以及已存在多年的贸易不平衡这两个关键问题并未通过对话得到解决，因此，美国国会未来通过对华强硬议案的可能性相应增大，将中美经贸问题政治化的趋势值得关注。美国行政当局和国会在对华关系（不仅是经贸关系）中一个唱红脸，一个唱白脸的状况并没有改变。美国学者乔纳森·雅

各比将此形象地称为：“美国对华经济接触一直在上演我们在政治电影中看到的‘好警察、坏警察’的经典游戏。布什政府已经做了很长时间的‘好警察’，而国会现在正在扮演短期的‘坏警察’一角。这两个角色似乎彼此明白对方存在的意义，因此不会将中美经贸关系推入绝境。”目前，民主党对华施压有加大的趋势，但我们不妨这样理解：美方的高要求是为了从中方得到高回报，议员们的要求也不会无限制提高，其最高点就是美方能在谈判桌上得到的最大利益。如长期对华持强硬立场的纽约民主党参议员查尔斯·舒默就曾表示，中国对美大规模采购并不能解决问题，“买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要改变游戏规则。”言下之意，中方要对美做出更大的让步。

事实上，中国已经做出了巨大的努力，美国也已获得巨大的利益。在金融领域，中国已全面开放人民币业务，取消了地域和客户对象限制，仅2005年和2006年两年，中国银行业吸收外商直接投资就超过了182亿美元，远远高于绝大多数发达国家。截至2006年年底，74家境外银行在华设立了312家营业性机构，28家境外战略投资者投资参股了21家中资银行，31家境外金融机构在华设立了31家合资证券公司和基金公司，另有44家境外保险公司在华设立了115个保险营业机构。中国服务业开放面向世界，而美国凭借竞争优势，成为中国服务业开放的最大受益者。例如，在过去5年里，美金融机构入股中资银行占中国银行业吸收外资总额的近40%；美律师事务所驻华代表处的数量占境外律师事务所驻华代表处总数的近45%，其业务收入占驻华代表处业务总收入的50%以上；美资企业获得直销经营许可占在华外资企业的55%；中国通过买断和进口分账两种方式自美进口电影121部，占进口总数的52%；自美进口音像商品的比重一直保持在50%至75%。此外，美在华投资设立的近5万家企业，99%以上已获得贸易权和分销权。

欲解决中美经贸关系中存在的问题，首先需要弄清问题的根源。以中美贸易不平衡为例。中美双方对此有着不同的理解。美方认为原因在于人民币币值过低、中国对出口产品提供政府补贴、劳工权利保护不够等。中方则认为主要是经济全球化的影响和美国对外贸易政策的后果，如储蓄和投资相关性、劳动力和投资配置的国际差异等等。中美贸易不平衡的原因是多重：由于中国对外开放，外国在华直接投资迅速增长，外商投资企业在中国出口总额中所占的比重从90年代初的12.58%猛增至1996年的40.72%，2000年达47.97%，2006年更是高达70%；国际资本流动反映在贸易上的结果，根据美国商务部公布的数据，美国对包括中国在内的亚太国家和地区的贸易维持着大体上的平衡；美国实施对华出口管制，制约了美国最具国际竞争力的高技术商品的对华出口。统计数据显示，2006年与2001年相比，美国对华高技术商品出口增幅比德国低287个百分点，比日本低100个百分点。美国对华高技术商品出口所占中国高技术商品进口总额的比重由18.3%降至9.1%，如果这个比重目前仍保持在18.3%，美国对华出口至少可增加700多亿美元。

中美经贸关系虽然存在种种问题与挑战，但主流趋势却是持续发展，这符合两国的共同利益，也是两国的努力目标。为使双边经贸关系更上一层楼，在新的经济与政治大环境中，中美之间应该建立正常的经贸关系。所谓正常的经贸关系指的是在正常的国家关系基础上，中美两国所进行的没有政治限制条件和其他种种人为障碍的经贸往来，它是中美两国在平等、互利、经济互补的原则下进行的。正常的经贸关系要求：（1）经济问题应与政治问题脱钩，用政治手段、政治方法去干预经济问题是不足取的，有害的。经济问题的发生、发展和终结有其自身的规律和规则，只有真正做到经济问题与政治问题脱钩，中美双边经贸关系才能摆脱政治影响而按照客观经济规律正常发展。（2）经济摩擦与矛盾是任何经贸关系所不可避免

的，经济手段与方法应是解决经济摩擦与矛盾的基本方式。（3）谈判而非威胁更非制裁是解决问题的最主要途径，任何威胁、恫吓、制裁都是强权政治的表现，不是中美之间正常的经贸关系所需要的。（4）中美双方均需要用新思维去构筑正常的经贸关系。一个经济上强大的、遵守国际准则的、与世界经济融为一体的中国不仅可以为美国提供商业机会，更是亚太地区乃至世界和平与稳定的重要支柱之一。当然，中国也需要为进一步改革开放创造良好的环境与氛围。

自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美国对中国的出口增速是对其他国家出口增速的 3.7 倍。因此，中美两国之间的相互依赖进一步加深，两国之间的共同经济利益也进一步增加。美国著名智库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CSIS）和国际经济研究所（IIE）最近在它们联合出版的《中国：资产负债表》一书中指出，中国给美国带来的经济利益是无可争议的。中国市场快速增长促进了美国的出口，中国对美国的出口以及对美国金融资产的投资则帮助抑制了美国的通货膨胀和利率上升，为美国经济快速增长和提供更多就业机会创造了条件。基辛格认为，“中美两国关系发展也面临一些新问题，但无论如何保持合作关系至关重要。”^[9] 作为世界上最发达的经济体和增长最快的经济体，在全球化迅速推进的今天，中美两国的合作对于全球都至关重要。这或许正是中美战略经济对话的要旨所在。而且，作为中美两国政府间最高级别的战略对话，中美战略经济对话应当成为两国间一个机制性的互利共赢的交流平台，不仅是美国，中国也应当从中获得有利于自己发展的政策空间。只有这样，战略经济对话才能持久、有效、充满希望地进行下去。当然，由于中美之间软、硬实力的不对称性，从长远看，中国通过战略经济对话维护自身合理发展权益的路还会很长。

总之，由两国元首倡导设立的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机制，其目的是加强两国就全局性、战略性、长期性经济问题的沟通和协调，以增进互信，加强合作。应该看到的是，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有别于一般的经济对话，不是着眼于解决短期的具体问题，而是着眼于对中美双边经济、甚至对全球经济都有重大影响的大问题。这些大问题都不是在短时间内，或者是通过几次对话就能够解决的。中美战略经济对话的意义更多是增进了解，加强沟通，增信释疑。只有这样，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机制才能在后布什政府时代继续有效开展下去。

注释：

[1] 《人民日报》2006-12-16，《胡锦涛会见出席中美战略经济对话的美方代表》。

[2] 同上。

[3] http://www.ustr.gov/assets/Document_Library/Reports_Publications/2006/asset_upload_file688_10223.pdf

[4] Condoleezza Rice, "Promoting the National Interest", *Foreign Affairs*, January/February 2000, p.57.

[5] *The Washington Post*, Sept. 22, 2006.

[6] *The New York Time*, May 17, 2007.

[7]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May 21, 2007.

[8] *The Washington Post*, Sept. 22, 2006.

[9] *The Washington Post*, May 21, 2007.

（作者简介：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教授，博导，博士，上海，200433）

收稿日期：2007年8月